有困难找警察，派出所“包打天下”？

◆特别关注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会转型时期利益诉求多元、各类矛盾交织，基层派出所面临的工作局面千头万绪、越发复杂，甚至陷入“包打天下”的困局，大量非警务活动占用警力、工作考核五花八门，许多基层民警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和身心亚健康状态。

“万能派出所”：清理小广告、驱赶流浪狗……

“警察同志，我儿子把钥匙带走了，你过来给我开下门！”

“110吗？我女朋友要跟我分手，你们能帮我劝劝她吗？”

“我儿媳妇不好好给孩子喂奶，这事警察得管管！你们快过来！”

这是记者近日在一些派出所蹲点调研时，听到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接处警记录。对处在社会最基层和矛盾第一线的派出所民警而言，这只是他们工作时所遇到困惑中的一部分。

“群众对公安机关的心理需求相当高，这份信任让我们欣慰，但一些诉求也让人哭笑不得。”四川成都市主城区一派出所的社区民警说。即便是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报警需求，多数情况下民警依然会第一时间处警。

多位受访民警表示，“头顶国徽、臂挂盾牌”的责任，会让他们坦然乐观地面对工作中的危险与艰辛。但令他们感到苦恼的是，无效报警、大量非警务活动等牵制了本就紧张的警力资源，基层派出所越来越演变为“包打天下”的“万能机构”。

“群众有困难、找民警，这是好事。但有些部门放大了这句话，为派出所增加了大量非警务活动，甚至把本由他们承担的工作也推给公安机关，影响到我们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的主业。”西部某市一位派出所民警举例说，当地要创建卫生城市，民警被要求全员出动上街清理小广告；创建文明城市，民警要到处驱赶流浪狗……

“上面下面条、底下打面团”，作为基层一线单位，上级机关布置的大量工作都要靠基层派出所来落实。而一些地方文山会海回潮、材料信息过多过滥、考核名目内容繁多，也让基层民警身心俱疲。

西北一位从警23年的农村派出所所长说，所里曾在一个月之内收到分局下发的64份文件，其中40多份是安排具体工作的。该所辖区面积2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万余人，但仅有7名民警。“40多项都是重点工作，一个月只有30天，我们7个人不眠不休也干不完。”

西部某市一位派出所所长告诉记者，在他所在的区，上级机关对派出所的考核门类多达70多项，破获各类案件的数量都有具体的指标要求，而有些不尽合理。

“例如，破案数量是按月度考核的，但有些案子需要花时间去经营、深挖。迫于考核压力，民警就只能去办理一些小案、现案，无暇办理大案。”这位所长苦笑说，这种考核是“月月都要麦子黄、月月都要粮进仓”。有的地方向被行政拘留、羁押的人员征求满意度，一位民警反问：“我抓了他，他能对我多满意？”

更令民警忧心的是，在一些地方，执法环境局部恶化，一些自媒体对涉警事件的歪曲报道等，加剧了少数群众对公安工作的误解，让民警流汗又流泪。

西部一地级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说，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该市发生暴力抗法和侵害民警权益的行政案件88起、刑事案件15起。许多民警在正常执法时，都遭遇过推搡、辱骂、恐吓甚至暴力抗法行为。有民警说，自己在执法中曾被人打伤，对方却高喊“警察打人了”，少数群众围观起哄，他感到非常寒心。

武汉铁路公安处乌龙泉东所民警冒酷暑巡查后进行“降温处理”。

长期超负荷运转 最怕夜里电话响

入伏以来，武汉连续多日高温。武汉火车站派出所民警罗居奇正在站内巡逻。手铐、警棍、急救包、执法记录仪、通讯电台……他背负着六七斤重的警用装备，警服完全湿透。随身携带的计步设备显示，他当天已步行超过两万步。

“每天5点多钟D5930始发，铁路公安已开始执勤。每晚11点44分最后一趟D5925抵达，站区内依旧警灯闪烁。”武汉站客运值班员肖功峰说，守护安全，他们不知疲倦。

在陕西省兴平市，西吴派出所副所长张荣国已经3天没有回家了。这是他7月18日的工作安排：早上6时起床，6时50分开会布置工作，7时50分和同事出门办案，回来后接待群众来访。中午无暇休息，下午赶赴犯罪嫌疑人家中发放逮捕通知书，之后进村采集信息，回所后和同事分析案情……18时接班后，张荣国还要在岗位上再值守24小时，随时准备接处警。

“每年我有200多天在所里住，一有案子就没日没夜。3岁的孩子只能托付给老人带。”提及家人，张荣国一脸愧疚。

四川省眉山市象耳派出所副所长杨柳从警10年两次因公负伤，是一位揣着残疾证坚持在一线办案的刑警。他今年33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办一个案子，从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到羁押，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杨柳说，一个月里他能陪小孩的时间不到两天，这也是他作为父亲最大的遗憾。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常年处在打击犯罪、调处矛盾和服务群众的第一线，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超负荷运转已是许多基层派出所民警的工作常态。

“派出所工作的特点是生活不规律，遇到紧急任务、办案或值班备勤，通宵达旦、放弃休假都是常事。上级公安机关一直鼓励大家休年假，但许多人都放弃了。不是不想休，是真的走不开。”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化工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张思强说，全所19名民警，大多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职业病。

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韩森寨派出所副所长汪勇帮助一位社区群众搬运物品。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坐针毡，最怕夜里电话响……一位民警如此描述自己工作时的心理状态。不少民警因此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被称为“喇叭所长”的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分局欧庙派出所原所长吴继革，安装了3个心脏支架、进行了2处“心脏搭桥”手术，仍带病长期忙碌于处警一线。2015年7月，在冒着高温处置一起紧急警情时，他晕倒在地，生命定格在了46岁。

“天天在流血、月月有牺牲”，一组数据佐证了公安民警工作的艰辛。湖北省公安厅今年1月的统计显示，近5年来，湖北公安系统先后有55人因公牺牲、866人因公负伤、321人在职病故。2012年至2016年间，陕西共有46位民警牺牲在工作岗位上，402位民警在执行任务时负伤。

优化环境、下沉警力 基层派出所亟须“减负”

一些受访民警认为，除机关与基层警力配比不当、各职能部门间履职合力不足外，缺乏维护民警执法权的保障机制，也是造成基层派出所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现场处置时没有底气，并不是因为害怕犯罪分子，而是来源于现实各方面的压力，不敢果断地执法。”一位民警说。

采访中，许多派出所民警也欣慰地表示，近年来基层的许多呼声已经得到高层重视。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就提出，围绕公安改革，解决管理体制不科学、力量结构不合理、警务运行不顺畅等突出问题，提高职业保障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基层执法环境逐步改善，从优待警的政策也在不断落实中：湖北省公安厅探索建立起以财政补助为基础、商业保险为补充、民警互助为支持的“三位一体”优抚机制；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出台从优待警25条措施，提出“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健康上关爱、生活上关心”民警……

然而这些还不够。为让民警安心、舒心、放心地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和服务群众等主业上有所作为，基层派出所还须“减负”。

一是出台并落实相关法律法规，优化执法环境，维护民警的执法权威和公信力。湖北、陕西、四川等地民警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探索建立一定范围的容错机制，为执法者壮胆撑腰，对妨害正常执法的行为敢于“亮剑”。

二是推动警力下沉，夯实基层派出所力量。有民警呼吁，公安机关在公务员招录时，宜对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有所倾斜，使更多有专业能力、热爱公安事业的人才进入警察队伍。

三是对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派出所职能进行精准定位，厘清警务和非警务活动的界限，列出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改变派出所“包打天下”的现状。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茂陵派出所所长狄军锋建议，建立“110”报警电话分流机制，将各职能部门纳入其中，依照职责划分共同为群众服务。

四是优化合并考核项目，削减文山会海，将基层民警从繁重的文牍和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此外，切实落实中央和地方有关从优待警的各项举措，关爱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民警的身心健康。 □ 据《半月谈》

诗和远方要多花些心思去抵达

◆周末评论

最近有媒体关注到“白鹿原”文旅产业的尴尬现状。随着电视剧《白鹿原》的热播，滚烫的资本涌入这个仅2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至少六个以“白鹿原”为主题的特色文化旅游项目拔地而起。然而，这些民俗村除了陕西小吃，几乎没有卖点。连排成片的仿古建筑群因为太相似，如今只剩了荒草丛生。在激烈的竞争之后，这些项目有的只能勉强维持，有的则已关门大吉。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更加旺盛，消费升级和政策红利引领下的文旅产业，正在成为“市场需求的宠儿、经济发展的骄子、资本追逐的对象”。然而，一些地方文旅产业的“滑铁卢”也告诉我们，文旅产业虽然是一片蓝海，但蓝海里也出现一窝蜂涌入现象。有的项目既无质量也无创意，既不关心文化也不热爱旅游，一心想着把“风口”变现，结果就发现今天的游客不那么好忽悠了。

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地方大投入的文旅项目，有时候甚至不如老乡自娱自乐的景区活得久。那些原生态乡村旅游景区看起来土俗，却能找到适配的目标受众，关键就在于结合当地文化习俗，成功挖掘出了富有特色的东西。这也提醒人们，在不惜重金投入文旅项目的时候，首先要深究，这个文化项目的“魂”是什么？如专家所言，一个文化项目的核心，绝不仅是地理的象征，“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血肉和灵魂，其中的文化精髓应是当地生命活动中形成的传统、风俗、生存方式、思想观念等。”强大的文化资源，同时也意味着受众更高的体验期待，如果从业者不能认真地去打造历史文化特色，只是急功近利地追热点，必然会掉进同质化的陷阱。

当然，文旅产业的优劣，不能一概以赢利与否来做判断。以中国游客数量之多，一个项目短期赚钱总有门路。比如在临潼，游客稍不留神就能被骗去假兵马俑景点，与双眼皮兵马俑合照。这样的山寨兵马俑，临潼有关部门曾一夜之间销毁40多个。若想文旅品牌不被冒牌货亵渎，首先当然是加强监管，但也提醒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低水平仿制为何如此吃香？那是因为对真景点的需求出现了井喷，谁都想来看看举世瞩目的兵马俑。我们真该多花些心思，才能回报这种可贵的“注意力资源”。

这些年，我国居民消费已经步入快速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文化旅游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与此同时，普通消费者对文旅“供给侧”改革的热切呼唤，也时常可闻。我们的旅游产品供给，远远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需求。比如，各地都上马高度相似的“老街”，从这个古城到那个古城，从名山脚下到高原之上，总能买到一样的商品，听到同样的民谣，品尝到相似的小吃，甚至到了晚上，大多会上演大型实景演出，总有似曾相识之感。为何？还是因为不珍惜群众旺盛的旅游需求，宁可懒惰地搞搞“一锤子买卖”。

人们去一些文化景点，往往是被与之相关的文化内涵所吸引，这当然蕴藏着商机，却不应被滥用。在对待文化旅游的问题上，最需提防的是心急。很多长盛不衰、风靡世界的文化旅游项目，背后往往有对文化品牌的敬畏，同时还有对服务细节的追求。有心人将文化和旅游比作“诗和远方”，要真正到达那么诗意的境界，我们还需要日复一日的深耕，才能对得起见识和品位不断提升的消费者。 □ 刘少华

按下“暂停键”，共享单车下半场如何继续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行市场。

共享单车以全新的、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中国居民的日常，但也面临着商业模式的拷问和日益严格的城市管理。

然而，在政策限制之下，共享车企依旧在大量融资，继续走资本驱动型道路，共享单车的下半场将面临何种变局？

“围城”“坟场”频现，单车何处安放？

那些曾经遍地都是且仍在上演“单车围城”的共享单车，如今很多已堆积成山并成为“废品”，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

盲目跟风催生出一哄而上的热潮，当初有多少企业上马，最终就会造成多大的问题。

根据北京市交通委8月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北京部分区域，共享自行车的月活跃度水平不足50%，近一半车辆处在闲置状态。

数据显示，仅在去年共享单车投放总量就有将近2000万辆，报废之后会产生近30万吨废金属，相当于5艘航空母舰结构钢的重量。同时，一些共享单车企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单车往往采用不通用的配件，除了变成废铁外几乎一无是处。

不管是单车被大量堆积在一起影响市容和环境，还是最终变成废铁，其实都是严重的浪费。

按下“暂停键”，共享单车如何由乱到治？

共享单车造成的严重浪费问题，已经引起多地政府的警觉，明确限制共享单车投放数量。

近日，北京交通委就宣布了将继续实行增量限制和减量调控的政策。上海自去年8月起也推出了类似政策，规定每家企业留存一定的共享单车投放名额，多余的共享单车都将被搬离，并且要求重点清理包括交通枢纽、公交站点、小区、医院和商务办公区等地域范围。

在产业观察家洪仕斌看来，共享单车的超额投放不但造成设备上的浪费和资源消耗，而且大量占领城市公共空间，对城市的公共交通管理形成了很大的障碍。政府此举是为了引导共享单车企业理性投放、良性发展，并对现有的商业运作模式和逻辑表达质疑。

资本驱动，烧钱之路能否长远？

对于共享单车企业来说，叫停共享单车相当于给失控的单车投放战争踩了刹车。而眼下，共享单车企业依旧在大量融资，继续走资本驱动型道路。在城市政策的限制之下，这条道路还能走多远？

自去年6月起，随着悟空单车、酷骑单车、小蓝单车等陷入押金风波，并走向破产倒闭，共享单车市场开始走到下半场，逐渐形成摩拜、ofo和哈罗单车三足鼎立的格局。而这三家企业依然离不开资本的支持。

在找不到能够自我造血的盈利模式下，对资本的依赖依然是共享单车面临的共同问题。经过2017年的整合，共享单车平台的角逐，逐渐演变成了资本的拉锯战。

摩拜背后有美团的支持，而美团背后站的是腾讯；复活的小蓝单车和青桔背后站着滴滴；哈罗单车有蚂蚁金服的加持，蚂蚁金服背靠阿里的大山；而ofo被阿里和滴滴共同投资过，但又被同时止步。

外界普遍认为，大多数共享单车玩家依然走在烧钱扩张的老路上，尚未真正开始探索商业化盈利模式。

洪仕斌认为，大量融资说明共享单车企业自身造血能力不行，但仅凭融资维持运营，也并非长久之计。“这些企业自身也意识到了商业逻辑上的缺陷，现在政府从外部施压，促使它们改变原有的路径，或许会是一剂‘好药’。单车企业未来的比拼是全方位的，除了资金流能力，更加看重商业模式以及团队的运营能力。”

当资本回归理性，风口已过，盈利成为企业生存下去的第一要务，市场将考验企业的生存能力。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专家胡延平认为，共享单车企业要想盈利，要想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补好三门课：第一，精细化运营；第二，要通过技术驱动去解决损耗率高、无法追踪等问题，包括应用大数据去优化布局；第三，长期耕耘，包括跟一些大平台合作，增强产品服务的增值能力，一步步逼近成本效率的临界点。 □ 薛笔犁

■视 点

敦煌石窟文献还原古老秋食

8月7日，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敦煌研究院当日梳理解读了敦煌石窟文献中古人吃秋食的养生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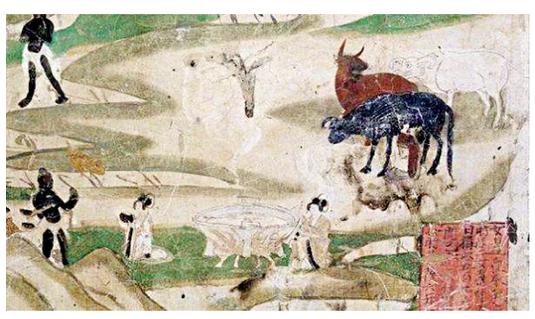
“立秋之时食瓜，曰咬秋。”是《津门杂记·岁时风俗》中记载的立秋习俗。人们相信，立秋吃瓜可防秋燥、免腹泻，以及不生秋痱子。敦煌自汉代就有种植瓜果的历史，班固的《前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敦煌，中部都尉治部广侯官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其地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敦煌南靠祁连山，周围又有草场宜牧，畜牧业便成为了古代敦煌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鲜奶浓缩发酵而来的奶酪也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唐代敦煌的僧人和上层贵族就经常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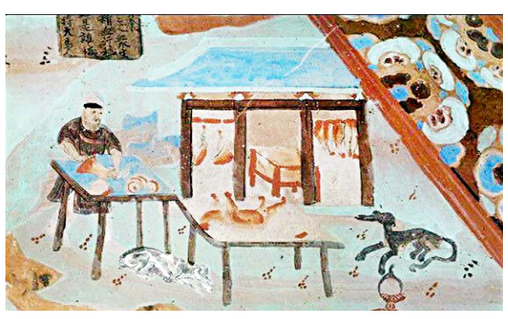
牧羊人将乳酪送到寺院，制作乳饼，这在敦煌文献《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中有明确的记载，“粟壹斗，与牧羊人送乳饼用”“面贰斗，与牧羊人送乳饼用”。

敦煌研究院称，唐五代至宋，肉食是敦煌人的饮食结构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来源主要是饲养的家畜、家禽肉以及猎取的野生动物，尤其饲养的羊，成为敦煌人餐桌上的主角，这在莫高窟第85窟晚唐时期的壁画《楞伽经变之肉坊》中就有具体描绘。

除了寻常的羊肉，秋日偶尔来点野味更进补。莫高窟第85窟中晚唐时期的壁画《楞伽经变之出猎》描绘了唐代猎人们整装出猎，均戴幞头，着缺胯衫，足穿半腰靴，他们中有立鹰于手臂的，有单手牵犬的，有持弓挎箭囊的，甚至还有扛斧的。 □ 徐雪



莫高窟第61窟的《村女献乳》（五代）



莫高窟第85窟《楞伽经变之肉坊》（晚唐）

莫高窟第249窟《狩猎图》（西魏）